# 聂塘卓玛拉康研究三题：汉藏风格造像、汉式木构殿堂和藏文创建史料丛考

魏　文

**内容提要**　聂塘卓玛拉康是后弘初期噶当祖庭，现今遗存迭经后期改造，原貌已失。本文第一题集中讨论殿内现存早期佛教造像的风格样式，发现其汉式佛、菩萨和天王造像做法源出于中唐时期流行的“长安样式”，而汉式四天王造像和藏式佛、菩萨造像则主要体现出中晚唐河西造像艺术的面貌。第二题基于实地考察和初步测绘，论证出卓玛拉康最古老的建筑无量寿佛殿实为一汉式大木构殿堂，其建造年代应早于元朝。第三题则在上述两部分研究的基础上，从藏文史料译释入手探讨卓玛拉康的成立史，指出其创建的历史叙述虽然存在多种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创建和维持与卫藏四大部族中的拔、热两族和后弘初期下路弘法关系密切。

**关键词**　聂塘卓玛拉康　阿底峡　无量寿佛殿　长安样式　汉式大木构　喇嘛丹巴

卓玛拉康（sGrol ma lha khang）位于拉萨西南20公里处的吉曲河（skyid chu）西岸的聂塘（sNye[mNyes/gNye] thang），海拔约3623米。寺院主体建筑为朝向东偏南30°的长方形院落，宽60米，长78.5米，具有双重院墙。此寺历来被看作噶当派根本祖师阿底峡大师（Atiśa）的纪念堂，保存有为数众多的后弘初期的佛教圣物，故通常被认定始建于11世纪中期。寺东南400余米处为供奉灵塔的确康（mChod khang），其内左为噶当派根本祖师阿底峡大师灵塔，右为14世纪萨迦派领袖喇嘛丹巴索南坚赞（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灵塔。2001年寺和塔同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尽管卓玛拉康历来被视为西藏佛教圣迹，但近千年来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卓玛拉康营建、维持和修缮的记载却几付阙如，我们只能在一些早期上师，如热译师（Rwa lo）的传记中看到它作为巡礼和供养的对象而出现。至14世纪时，萨迦座主喇嘛丹巴因为政治原因长期住锡聂塘的确宗寺（Chos rdzong），并以聂塘为中心在前后藏各地游方，因此卓玛拉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新整修，关于这段史料后文将着重展开，于此不赘。

此后卓玛拉康的历史又陷于沉寂，18世纪中叶总管西藏政务的郡王颇罗鼐（Pho lha nas，1689—1747）曾经广修西藏古寺，其传记中就提到在火鸡年到铁狗年间（1729—1730），因为“聂塘的无比阿底

峡灵塔已经朽坏，故此进行了修缮”[1]。但同时是否亦曾维修过卓玛拉康则未明说，然卓玛拉康内中殿现存的二十一度母铜造像据说就是颇罗鼐施造献给卓玛拉康的[2]。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颇罗鼐有可能也同时修缮了卓玛拉康，只不过维修的规模不大。二十余年后的水阳猴年(1752)，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mtsho)对卓玛拉康的整个建筑及其全部佛像进行了修缮，在完成后奉献了如云一般多种多样额外的供品和食物[3]。可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卓玛拉康的基本格局大致就是这次维修的结果。至20世纪，第五世摄政热振活佛(Rwa sgreng hu thog thu)在1934至1940年间对很多藏地的圣迹进行了修葺，其中就包括卓玛拉康[4]。另外，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中提到卓玛拉康二层建筑系1920年左右增建，所据为何不得而知。总之，这两次修缮工程所进行的改扩建，增加了一、二层建筑和其他附属建筑，遂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规模。

现在的卓玛拉康主殿为一长方形二层建筑，前有宽敞的院落〔图一〕。其左右亦有晚期加盖的护法神殿和阿底峡大师的寝室，加上主殿二层均为清代至民国时所加，我们在这里不做讨论。一层长方形殿宇外绕转经廊道，其内如格鲁派寺院措钦大殿佛堂模式分隔为并排的左、中、右三间殿堂，左右两端各有二天王彩塑，合为四大天王。左间尊胜佛塔殿，内有四柱，围合成一、二层上下贯通的结构，当心间为高大的尊胜塔，从其形制上看年代极晚。其周围有保藏捺啰巴大师遗物的巨型噶当塔和吐蕃至后弘初期佛经写本等文物。中间度母殿四柱，正中仿大昭寺觉沃佛殿供一罩亭，内奉释迦牟尼佛和二胁侍菩萨。罩亭左、右、后方，供阿底峡大师的本尊度母像、木台佛塔、阿底峡的上师金洲大师的塑像、传为颇罗鼐施造的二十一度母像，以及其他年代颇早的造像、法器等圣物。右间名无量寿佛殿(Tshe dpag med lha khang)，南设殿门，门内有二明王像，殿内左、中、右壁各设端坐狮座的佛像一尊，中为无量寿佛，左右各有胁侍菩萨一尊，左壁为弥勒佛，右壁为燃灯佛，左右壁各有三尊菩萨，故殿内合为八大菩萨。这些造像保留了很多中古时代汉藏佛教艺术的风貌，下文将着重讨论。

2020—2021年，笔者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水历史文化工程项目，对卓玛拉康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此前不被注意的早期汉式大木建筑构件，同时也首次全面细致考察了早期造像遗存。有基于此，本文将从早期汉藏佛教艺术、藏地汉式建筑文化和建寺藏文史料等三方面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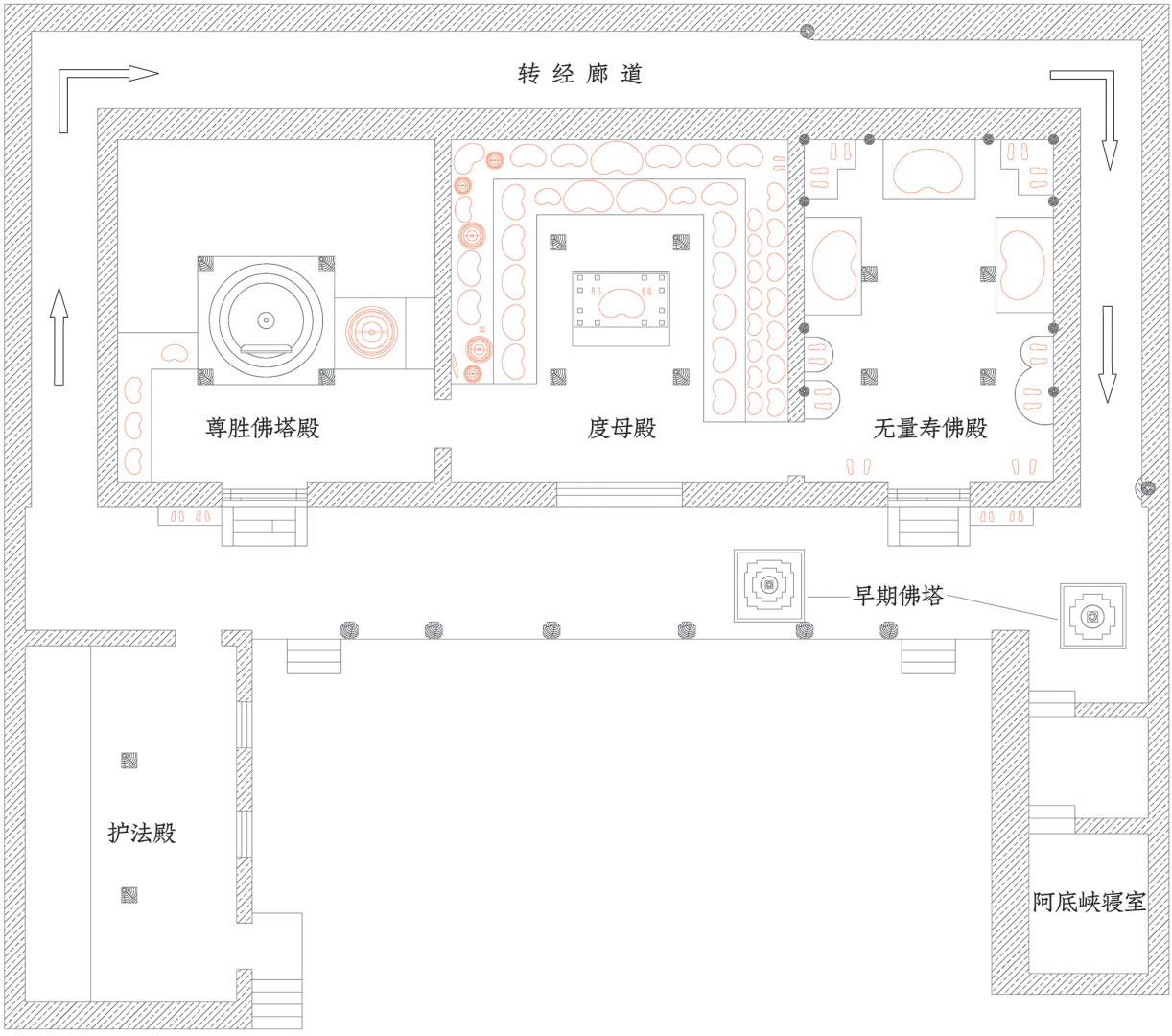
‹1› 原文作mnyes thang du mnyam med jo bo'i chen po'i sku 'bum nyams zhig tu gyur pa dang 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gyis 'debs par mdzad pa la mnyes thang chos rdzong zhig gso。多卡夏仲·策仁旺杰(mDo mkhar zhabs drung Tshe ring dbang rgyal)著，庄晶校《颇罗鼐传》(*Pho lha bsod nams stobs rgyas kyi rtogs brjod dkar chag*)，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729页。

‹2› sKal bzang, *Bod kyi ris med dgon sde khag gi lo rgyus mes po'i gces nor*,[dha ram sa la]: [bla brang skal bzang], 1995, p.243. 另有一说谓其是拉藏汗施造奉献，见后文引《司徒古迹志》材料所述。

‹3› 原文作'di skabs snye thang 'or gyi gtsug lag khang rten dang brten par bcas pa mtha' dag la nyams gso legs par grub rjes mchod rdzas dang bza' mchod sprin 'phar ma bcas 'bul bar mdzad，章嘉·若贝多杰(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第七世达赖喇嘛传：藏文》(*sKu phreng bdun pa blo bzang b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4› Dzasag Jampal Gyaltsen of Reting, A Brief Biography of the Fifth Reting Rinpoche Thupten Jampal Yeshi Tenpai Gyaltsen, *Tibet Journal*, 2011, p.82.

〔图一〕卓玛拉康主殿现状平面布局图
魏文制




开对卓玛拉康的讨论。

## 一　卓玛拉康早期造像的风格和年代

卓玛拉康很早就进入了现代藏学研究的视野之中。因为无量寿佛殿内完整保存的一堂早期泥塑造像，是卫藏地区硕果仅存的两处后弘初期泥塑造像作品之一。因此，除了一系列关于阿底峡入藏弘法历史的早期研究中会捎带提及以外，学者们对于卓玛拉康主要的关注点均放在这些早期泥塑方面〔图二〕。

如藏学大家诸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在1948年首次前往前藏考察时即曾路遇卓玛拉康，他看到这堂造像后认为他们虽然不会早至艾旺寺的造像年代，且经过后世修补，但仍然可以看出是十分古

〔图二〕卓玛拉康无量寿佛殿内景
魏文摄



老的造像[1]。此后罗伯托·维塔利（Roberto Vitali）即将其归入后弘初期以艾旺（dBye dmar）、孜乃萨（rTis gnas gsar）、夏鲁（Zhwa lu）、江浦（rKyang bu）、扎塘（Grwa thang）等寺为代表的“萨马达”类型进行讨论，认为其造像与“萨马达”类型一样，在采用西夏和波罗艺术混合风格的同时，体现出更加西藏样式的风格，早期萨珊式的团花纹样也减少很多，与图齐观点一样，认为其年代晚于萨马达诸寺[2]。维塔利将萨马达类型中的所谓“li lugs”中的“li”释读为西夏，从而认为萨马达类型中的汉风来源于西夏，乃至进一步认定卓玛拉康造像也体现出西夏佛教艺术风格，这显然是错误的认识。所谓“li”有可能是一种以于阗为代表的中亚的泛指，“萨马达”类型中确实有比较鲜明的中亚风格。而且，他所说卓玛拉康造像中萨珊式的团花纹样较少，进而认定其为更加藏式，这种论断也很站不住脚，因为就连他自己也承认没有进行实地考古调查。其后，乌尔里希·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也赞同上述两位学者的看法，并将维塔利隐晦地在注释中提到的一个年代线索，即嘉青如瓦喜饶旺曲（rGya ’ching ru ba Shes rab dbang phyug）建立德瓦坚寺（bDe ba can）的木牛年（1205）推断为卓玛拉康造像建立的时间[3]。施罗德推定的这一建寺年代显然也不可靠，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在德瓦坚寺创建的同时也

---

‹1› Giuseppe Tucci, *To Lhasa and beyond-Diary of the expedition to Tibet in the year MCMXLVIII with an appendix on Tibetan medicine and hygiene by R. Moise*,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dello Stato P. V. , 1956, pp.69-70.关于这塘造像较早无着装时的图片可见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pp.860-869.

‹2› Roberto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0, p.60.

‹3› Ulrich Von Schroeder,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p. 862. 另外，德瓦坚寺住持在与笔者座谈时称嘉青如瓦喜饶旺秋为宋朝的汉族僧人。然笔者认为此说法并无史料依据，不能因其称号中有rgya字就认为他是汉族。

大修过卓玛拉康。近年来独立学者马修·阿克斯特(Mattew Akester)出版了《绛央钦则旺布的卫藏圣迹志》(*Jamyang Khyentse Wangpo's Guide to Central Tibet*)，其中对卓玛拉康进行了全面叙说，发掘了不少和卓玛拉康有关的藏文史料，对我们开展具体的研究颇有助益。然而关于殿堂创建史、早期维修史乃至造像年代等仍未有新见[1]。

〔图三〕艾旺寺无量寿佛殿菩萨立像
[意]图齐著，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第四卷 江孜及其寺院》第三册：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图版50，第52页



虽然卓玛拉康造像与萨马达诸寺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下，且确有相同之处，然前者衣着简素，流畅自然，甚至轻柔贴体，明显区别于后者受中亚艺术显著影响的褶皱繁复，质地厚重的服饰造型〔图三〕。事实上，卓玛拉康造像可以鲜明地分为纯然的藏和汉两种风格类型：主尊无量寿佛和两侧的胁侍菩萨为藏式风格，其他二佛、诸菩萨、天王和力士均为典型的汉式风格[2]。其中，后者汉风浓郁，有明显刻意追摹盛唐至中唐汉地佛教艺术的意象；藏式风格造像则与8—9世纪的敦煌绘画和汉藏交界地带的摩崖石刻为代表的吐蕃艺术传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汉式风格可以明确追溯至盛唐至中唐时代的敦煌佛教艺术。如果将敦煌洞窟雕塑与无量寿佛殿造像进行图像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左右二壁二佛及六菩萨立像很明显是在刻意模仿盛唐至中唐时期汉地造像艺术的样式和风格。例如，菩萨立像的回鹘式发髻、项饰璎珞、斜披系结条帛、腰间系结、贴体紧致、褶皱均匀的帛纱，甚至交错的仰覆莲台座都与最为典型的盛唐窟——第45窟佛龛二菩萨神形酷肖〔图四至图六〕。此二菩萨装束简约素雅，衣裳轻薄贴体，褶皱均匀细谨，突出菩萨身姿之美，是受中亚影响的曹衣出水式菩萨的典型代表，流行于盛唐到中唐之间，与中晚唐菩萨装束普遍采取传统汉装褒衣博带、雍容繁缛的做法迥然有别。时代相近可堪比照者还有莫高窟第46、66、194、320等窟的造像[3]。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古时期，中亚、南印度、中原等多地区来源的佛教造像风格在敦煌并行不悖，而45窟这种造像风格则被归入盛唐以来产生、流行于长安，并以其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种"长安样式"当中[4]。因此，无量

‹1› Matthew Akester, *Jamyang Khyentsé Wangpo's Guide to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Chicago, 2016, p.219.

‹2› 白日·洛桑扎西《聂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风格讨论》，《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 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124—129。

‹4› 马丽《敦煌莫高窟第45窟与长安样式》，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常青《唐代长安佛教艺术样式及其渊源》，载氏著《长安与洛阳：五至九世纪两京佛教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91—422页。

〔图四〕**无量寿佛殿汉式风格菩萨上衣、配饰**
1. 左壁弥勒佛左侧胁侍菩萨　2. 右壁燃灯佛左侧尊胁侍菩萨　3. 右壁燃灯佛右侧胁侍菩萨
采自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fig.200A, 200D, 200E.


1


2


3

〔图五〕**无量寿佛殿汉式风格菩萨下裳**
1. 左壁弥勒佛左侧胁侍菩萨下裳　2. 右壁燃灯佛左侧尊胁侍菩萨下裳　3. 右壁燃灯佛右侧胁侍菩萨下裳
魏文摄


1


2


3

寿佛殿造像可以被视作"长安样式"除河西走廊以外亦曾流行于西藏的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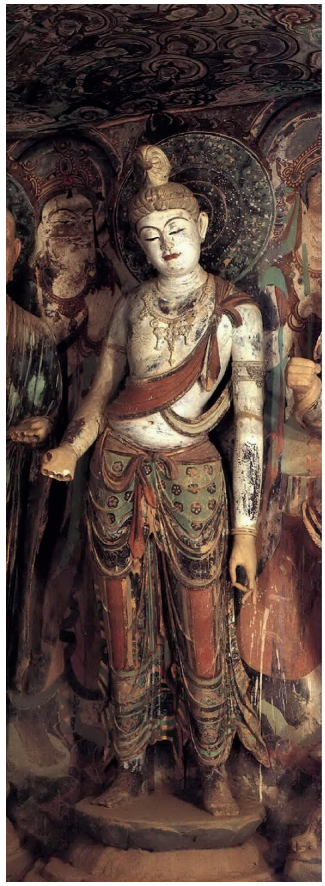
此外，异于汉式菩萨帛带打结的做法，无量寿佛殿多数汉式菩萨腰间系腰带，目前所见只有右壁最里一尊作帛带打结。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到同时代尼泊尔艺术的影响。同时，菩萨体态身姿亦非汉式婀娜之态，而是仍然传承了吐蕃时代造像身体直挺、臂膀壮硕的遗风。实际上这类唐蕃融合的菩萨造型在吐蕃后期至黑暗期，一直在敦煌、于阗等地区流行，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图七〕。汉式佛像则如左壁弥勒佛和右壁燃灯佛，着披袒右袈裟，左肩有防止佛衣堕肩的钩纽，以布带打结而不用圆环，是五代以前汉地袈裟流行的带饰[1]。袈裟皱褶塑造自然，极具写实主义，与最为典型的盛唐第45窟佛龛主尊亦如出一辙，是唐代中期典型的佛装样式〔图八，图九〕。

门外踩踏饿鬼的四天王塑像，身着明光铠，形制略有区别〔图十〕。其中广目天王和增长天王铠甲形制类似，头戴盛唐时代开始出现的卷边兜鍪，系护颈甲领，身穿甲衣，鳞甲下有缺胯袍和大口裤，着云头靴，两肩有兽首披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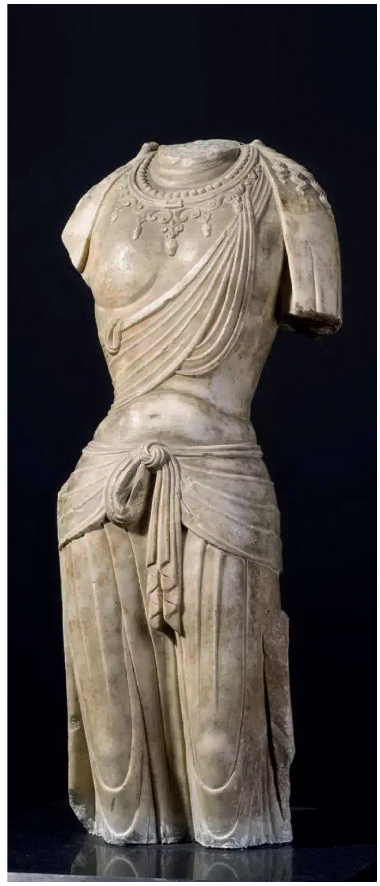
‹1›　有关钩钮及其穿戴方法可见费泳《佛像衣着中的"带饰"问题》，《民族艺术》2007年第4期。

和护臂，袍袖宽大，自然下垂。略有区别的是，持国天王着护臂胫甲，而广目天王无护臂，仅着绑腿。甲胄形制总体上与盛唐时代见于石窟寺的金刚力士和墓葬中的当扩、当野是十分一致的，在杨泓先生总结的唐代甲胄类型中属于第三型[1]〔图十一〕。唯二天王甲胄有抱肚护腰，其雏形出现时代已近晚唐，在中古时代以后方成为普遍流行的做法。多闻天王甲胄形式与上述二天王略近，然头戴非卷边兜鍪，则是来源于中亚的有顶锥兜鍪，其整体形式可以被归入上述唐代甲胄类型中的第二型。持国天王甲胄外还有一层罩衣，戴有红缨帽饰的卷边兜鍪，似可归入唐代甲胄类型中的第四型，年代在8世纪以后。总结来看，这组四天王造像的风格年代仍然以盛唐为主，有些元素较晚。除四天王以外，无量寿佛殿左右门壁内各有一尊赤裸上身的明王，左为马头明王，右为金刚手明王，其塑造技法亦以盛唐时代的金刚力士为蓝本，可兹比照者如盛唐开凿的莫高窟194窟西壁南侧力士〔图十二，图十三〕。

**〔图六〕唐代“长安样式”的典型面貌**
1. 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内北侧，盛唐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128
2. 西安宝庆寺七宝台唐十一面观音立像，8世纪初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3. 菩萨立像，8世纪初，西安市火车站工地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1


2


3

其次，主尊无量寿佛和二胁侍菩萨是较为纯粹的藏式风格。主尊着菩萨装，身披璎珞宝钏，双手结定印，全跏趺坐于狮子座上。右胁侍菩萨持剑，应为虚空藏菩萨，左胁侍菩萨持宝，似为普贤菩萨。二者身着吐蕃时代直裾单衣样式的大袖宽袍，交领和袖口均饰有萨珊式团花纹样，腰部系蹀躞带，足蹬六

‹1› 杨泓《中国古代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表三：唐代甲胄类型表”；刑月《中国古代佛教天王造像身着铠甲造型特征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7—184页。

〔图七〕菩萨立像图
9–10世纪，出自敦煌或于阗地区，57厘米×28厘米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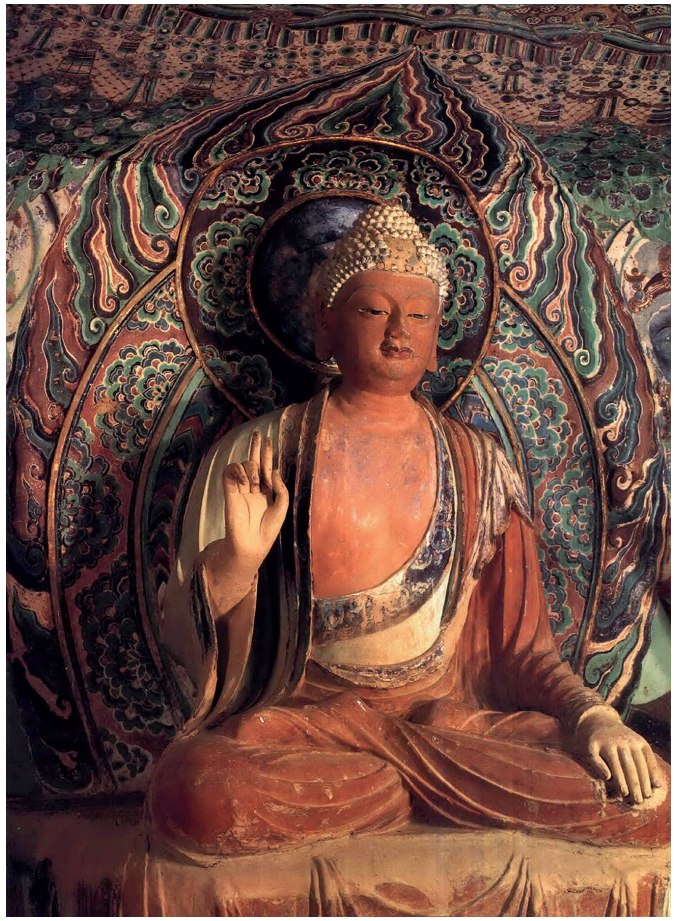


〔图八〕无量寿佛殿左右壁主尊佛像
1. 右壁燃灯佛　2. 左壁弥勒佛
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fig.199D, 199C.



1　　2

〔图九〕敦煌莫高窟第45窟西壁龛坐佛，盛唐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
文物出版社，2011年，图126



合靴立于仰俯莲台上〔图十四〕。它们与吐蕃晚期敦煌和汉藏交界地带流行的"大日如来+八大菩萨"石刻和晚唐时期敦煌石窟造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量寿佛着菩萨装，宽肩蜂腰，上臂壮硕。这样的身姿造型，再加上带连珠柱的臂钏等装饰[1]，与敦煌晚期深受密教影响的

‹1› 主尊佛臂钏现状虽然无珠串柱，但与其完全相同、应为同时所做的八大菩萨臂钏上，还清晰地保留有珠串柱，因此可以推想主尊佛臂钏亦有珠串柱，然已毁去。

〔图十〕**无量寿佛殿门外两侧四大天王像**
1. 右侧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　2. 左侧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
采自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fig.200L,200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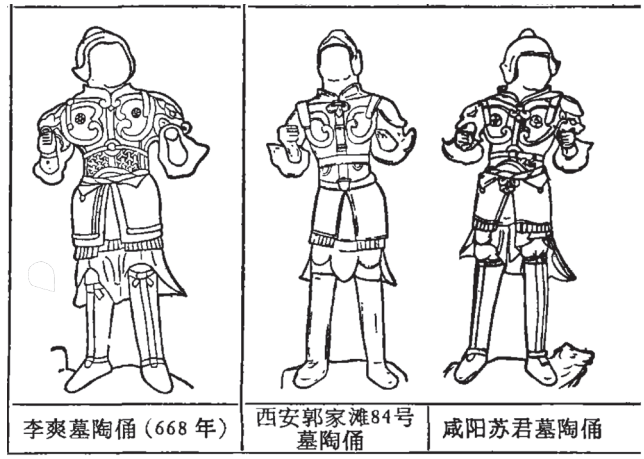


1



2

〔图十一〕**唐代甲胄类型表中的第三型示意图**
采自杨泓《中国古代甲胄（下篇）》,《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表三"




〔图十二〕**无量寿佛殿内门壁二明王像**
1. 右侧金刚手明王　2. 左侧马头明王
采自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fig.200N, 200O.



1



2

〔图十三〕**敦煌莫高窟第194窟西壁南侧力士，盛唐**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图41



洞窟绘画十分接近。例如，榆林窟第25窟主壁一佛八大菩萨曼荼罗中的主尊"清净法身卢那舍佛"和莫高窟第14窟的大日如来〔图十五〕[1]。主尊佛和汉式菩萨的臂钏上段的造型亦与上述二窟菩萨的臂钏大同小异，然下段璎珞则是来自西藏西部的造像做法，在萨马达类型寺院造像中亦可见到。

两尊藏式菩萨虽然遭到过度装銮，而且常年为现代佛衣所遮蔽，但是掀起佛衣下摆，我们仍可在下裳上看到满布萨珊式连珠团花纹的痕迹和菱格花纹边饰〔图十六〕。这是维塔利所未能见到的，因此他由此认定卓玛拉康造像萨珊

〔图十四〕**无量寿佛殿内正壁主从三尊造像**
1. 主尊无量寿佛　2. 右胁侍菩萨　3. 左胁侍菩萨
采自Von Schroeder, Ulrich, "Clay sculptures at snye thang monastery",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Hong Kong, 2001, fig.199A, 200B, 200C.



1



2



3

‹1›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87年，图169；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97年，图39。有关榆林窟第25窟此铺壁画的解读，参见沙武田《榆林窟第25窟：敦煌图像中的唐蕃关系》，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6—113页。

〔图十五〕榆林窟第25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变中的卢舍那佛，晚唐
采自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39



〔图十六〕无量寿佛殿内正壁主尊无量寿佛二胁侍菩萨下裳
1. 右胁侍菩萨下裳　2. 左胁侍虚空藏菩萨下裳
魏文摄



1



2

连珠纹较萨马达类型少，进而以此判定其更加藏式，年代更晚，显然是错误的。三世佛和八菩萨的桃形火焰纹头光和身光，继承自吐蕃晚期汉藏交界地带石刻，如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摩崖造像、芒康孜许摩崖造像、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等〔图十七至图十九〕[1]。主壁三尊的桃形三叶冠虽然很难确定是否原配，但与不少被定为11世纪左右的尼泊尔金铜造像上的三叶冠造型一致，事实上这也是汉藏交界地带吐蕃石刻造像头冠的基本形式[2]。三佛的六拏具则是后弘期以后新入卫藏的佛教图像元素，在造型和纹样与同一时代的扎塘寺（1081年建）和大昭寺觉沃佛堂（1076年修）主尊六拏具十分接近，与其造像应为同一时期所做。

## 二　卓玛拉康早期大木构建筑遗存及其复原构想

卓玛拉康在历史上经过多次重修和改建，因此开篇描述的殿堂现状已较其原始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二十〕。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藏文材料中所能找到的关于卓玛拉康本身的文字叙述很少，目前所

‹1›　张长虹等《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佛教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20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图4、5；王婷《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前揭《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图三。

‹2›　如丹玛扎摩崖造像中大日如来的三叶冠，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图三。

〔图十七〕无量寿佛殿三主尊佛像身光和头光
1. 左壁弥勒佛　2. 正壁无量寿佛　3. 右壁燃灯佛　魏文摄


1


2


3

〔图十八〕无量寿佛殿内左右两壁菩萨头光样式
1. 右壁主尊右胁侍菩萨　2. 左壁主尊右胁侍菩萨　3. 左壁主尊左胁侍菩萨　魏文摄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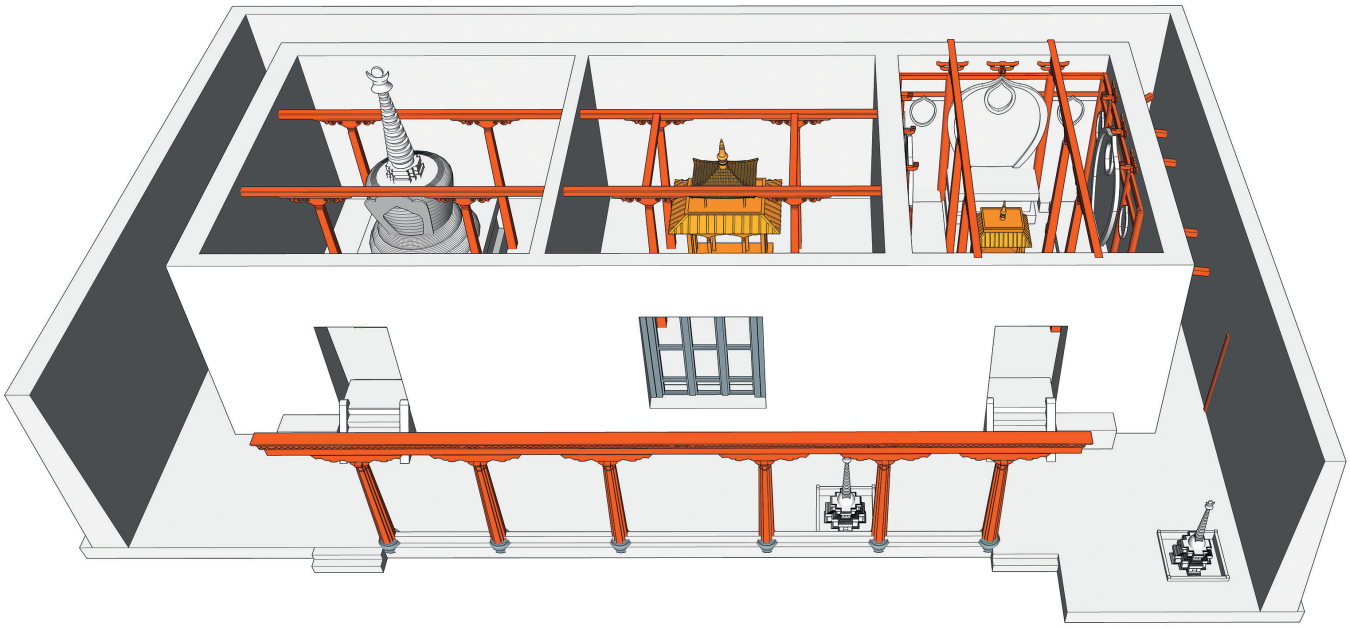
〔图十九〕吐蕃后期汉藏交界地带摩崖石刻造像的身光和头光
1. 西藏昌都察雅仁达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线图中的大日如来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图3
2. 孜许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摩崖造像线描图局部
采自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藏学学刊》(第16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第236页，图三
3. 青海玉树贝沟大日如来佛堂九尊中文殊菩萨局部素描图　魏文制


1


2


3

〔图二十〕卓玛拉康主殿内部现状俯视示意图
魏文 制



见最早的记录出自噶陀司徒确吉嘉措(KaH thog si tu Chos kyi rgya mtsho，1880—1923/25)的《司徒古迹志》(*dBus gtsang gi gnas yig*)，其中详细记载了噶陀司徒所见20世纪初(1920年以前)未经改扩建时卓玛拉康的基本面貌[1]：

> 上部卓玛拉康八柱铁网内是无比觉沃本尊米聚灵骨所依，和金洲大师之本尊能仁之身，又说这是金刚座师之本尊。此外，还有觉沃本尊度母五指身量利玛等具有灵验之所依[2]，装藏有觉沃锡杖、钵盂、袈裟祖衣等之利玛噶当塔三座，上好利玛能仁释迦等身像，拉藏汗建立的白度母如意轮为首的二十一度母品质极好之金铜等身像。甘珠尔和般若十万颂等不完整的金字写本大致二百函。它边上的十四柱拉康中有释迦能仁和八大菩萨，守护大门之二金刚等等身泥

‹1› 原文作gong du sgrol ma lha khang ka ring brgyad pa na lcags khra'i nang mnyam med jo bo'i thugs dam 'bras spungs gdung rten/gser gling pa'i thugs dam thub sku red kyang zer rdo rje gdan pa'i thugs dam yin 'bra ba dang/jo bo'i thugs dam sgrol ma li ma mkhyid gang tsam sogs rten byin can 'ga' gzhung gi dam 'byar/jo bo'i 'khar sil lhung bzed snam sbyar sogs nang gzhug tu yod pa'i bka' gdams mchod rten li ma mi tshad gsum/ston pa thub dbang li ma shin tu bzang po mi tshad gcig sog lha bzang gis bzhengs sgrol dkar yid bzhin 'khor lo gtsos sgrol ma nyi shu rtsa gcig zangs gser mi tshad che nges spus dag po/bka' 'gyur dang/'bum sogs gser chos skya bris ma tshang ba pod nyis brgya tsam/de'i rgyab log ka bcu bzhi'i lha khang du thub dbang nye sras brgyad/sgo srung khro bo gnyis bcas mi tshad 'jim sku/sngon gyi tshogs rnying/dbus su jo bo chen po'i 'dra sku tshad bcas/ma ala bzhi chog gsungs pa'i grwa bzhi sde/'og tu lh khang ser po'i nang/dbus su jo bo 'brom rngog thub sku bcas 'jim bzo/g.yas su sa 'bum ser po sgo mang mchod rten rtse med pa lta bu de jo bo chen po dpal ldan a ti sha'i gdung 'bum/g.yon gyi dkar po chen po de sa skya dpal ldan 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pa'i gdung 'bum mo/'dzin bdag sa skya pa'i dgon chung ra smad dgon lag zhig gis byed pa yin//, Chos kyi rgya mtsho, *dBus gtsang gi gnas yig*, lHa sa: Bod ljongs bod yig dpe rnying dpe skrun khang, 1999, p.107.

‹2› 译者按：其有噶丹颇章政府印封(gzhung gi dam 'byar)。

塑，是以前古旧之样貌，中间是大觉沃之等身佛像。说四曼荼罗供之四角品类。下部的黄色拉康内中央有阿底峡、仲敦巴、俄译师、佛陀等尊像。右侧有如无顶之十万金色多门灵骨塔，此为具吉祥阿底峡之灵塔。左侧大白塔为萨迦具吉祥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之灵塔。为萨迦小寺然麦寺[1]所有，为其属寺。

这一描述与现状颇有不同。首先，那时的卓玛拉康主殿分为左、右两间，左间内为八柱，大致上现状即是在此八柱间当中砌墙而分隔成了左右两间，右间和现状无别，在墙体内环绕一周恰为十四柱。其次，这里没有提到现状左间通高至二层的尊胜佛塔，想此塔应即为后来热振活佛改造卓玛拉康添加二层建筑时将八柱间隔断为两间后所做的改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宿白先生于1959年下半年参加中央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对当时西藏各地的文物遗存进行全面调查时，详尽记录下了当时未经扰动的卓玛拉康原状，其与现状基本一致。这在历经沧桑的西藏实属难得，至可宝贵。需要注意的是，宿白先生在讨论卓玛拉康建筑的整体布局时认为[2]：

左室亦前壁设门，内奉三世佛、八大菩萨和二护法，室中布置阿底峡像。左右两室门通前廊，廊深一间，前沿树六柱。自左第一、二柱间和前廊左端尽处各建细长十三天之白塔一座，前者传为阿底峡灵塔。按此寺主要建筑——外绕礼拜道的横长方形佛堂与同属噶当派的日喀则那塘寺相似，因疑佛堂与前廊部分尚存13世纪旧制；但佛堂内分截三室与色拉寺措钦大殿和吉扎仓的佛堂格局相同，廊柱托木与甘丹寺阳拔健天井后建托木接近，当皆出自后世重修。

在此，宿白先生认为具有转经廊的横长殿堂是卓玛拉康的原始构造，他的依据是13世纪初兴建的纳塘寺觉冈大殿与此相似[3]。然而，从多次现场考察的结果来看，宿先生的这一论断显然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从建筑遗存来看，目前所见卓玛拉康横长的殿堂是多次改扩建后的结果，和原始布局及构造已相去甚远。

现存左、中、右三间佛堂中，左、中两间内建筑构件均属极晚期，唯有右间，即无量寿佛殿内保存下来很多年代颇早、且属典型的汉式大木建筑构件遗存〔图二十一，图二十二〕。从现存建筑本体来看，具有诸多早期泥塑作品和建筑元素的无量寿佛殿被包裹在晚期增改的建筑之中，其进深8.9米，面宽6.5米，与不少西藏早期佛堂建筑一样，进深较面宽大。殿内地平面较殿外高0.6米左右。殿内主要空间由左、后、右三壁均匀分布的嵌入墙壁的十根立柱围合而成，呈现进深四间，面宽三间的布局，立柱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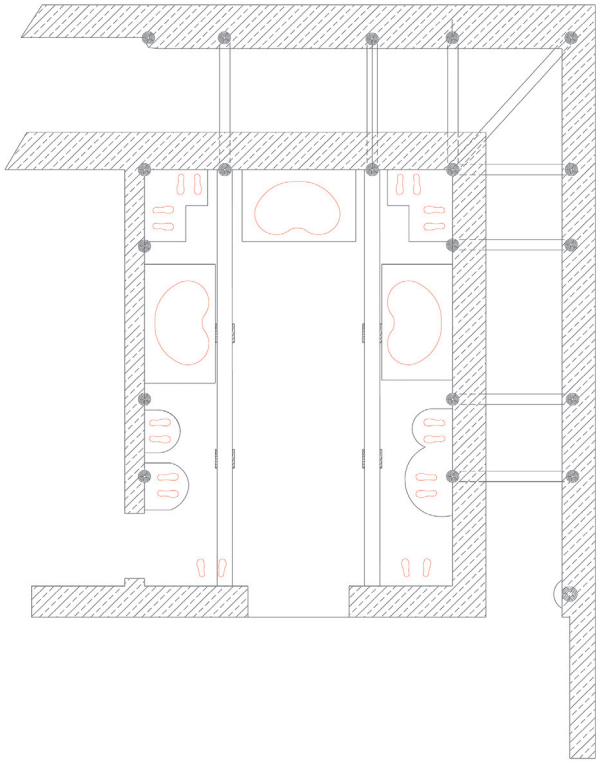
---

‹1› 然麦寺（Ra smad dgon）位于贡嘎县吉雄镇，14世纪时曾是桑普寺的十大属寺之一，由桑普寺第三十五任法台法主林美班底达喜饶班丹（gLing smad paṇḍta Shes rab dpal ldan）创建，在第十任法台杰赤列班觉根据阿底峡大师的授记在殊胜之地吉雄地方建立寺院，即然麦寺。此寺15世纪以来一直是弘扬萨迦派，尤其是俄系教法的学问寺，至二十五任法台莫钦贡嘎伦珠（rMor chen kun dga' lhun grub）时广传道果法而颇具声望。*dPal gsang ra ba smad kyi chos spyod*, Sa rngog rig gzhung dpe tshogs, Sa rngog rig gzhung gces skyong khang, 2022, pp.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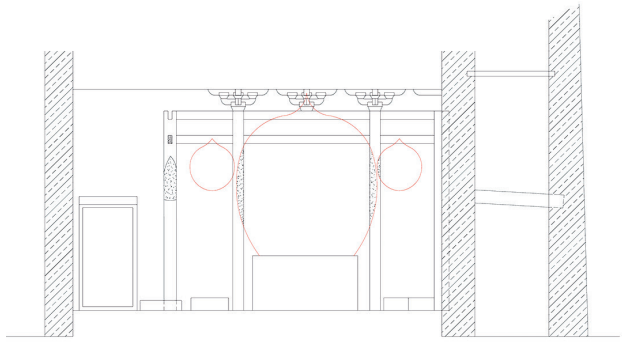
‹2›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41页。

‹3› 前揭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120—1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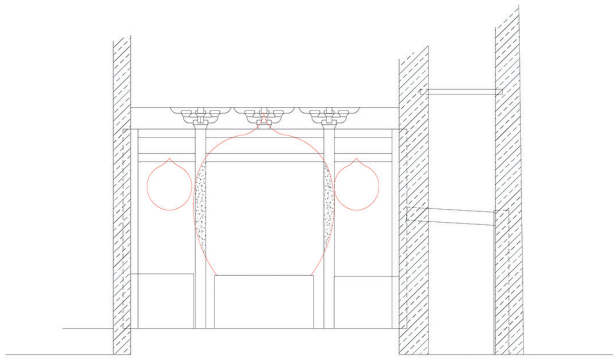
〔图二十一〕无量寿佛殿现状俯视平面图
魏文制



〔图二十二〕无量寿佛殿结构测绘图
1. 侧立面图　2. 正立面图
魏文制



1



2

均略呈梭型，柱间均隐约可见阑额和由额相连，柱上无普拍枋，此一檐柱与斗拱层连接的构件最早出现于五代(即大云院弥陀殿)，入宋后渐趋普遍，因此无普拍枋的做法仍属因袭唐风之特征。后壁当心间面宽间距3.12米，左、右次间间距约为1.69米。左右壁由内向外进深第一进间距为1.61米，第二间间距为3.3米，第三间柱间距1.65米，第四间柱间距为2.34米。殿内目前有两列四根藏式方形柱子承托天顶重量，方柱面宽间距2.8米，进深间距2.7米，上安托木架起纵向二梁，在后壁处直接粗暴地搭架在原柱头斗拱结构的华栱上。

十根立柱之上为汉式斗栱层。除转角铺作已毁外(左后转角墙内尚残存一段正心慢栱)，各柱头和当心间柱间均可见较为完整的出跳第一杪的斗栱铺作一攒，露明的斗栱铺作包括栌斗、泥道栱及其上的散斗和托起的柱头枋，华栱及其上的交互斗，还可隐约见到包裹在天顶锦缎里的偷心造之第二杪，以及隐刻的慢栱等构件，其中栌斗欹颛明显，是元明以前的早期法式特征〔图二十三〕。可惜的是，天顶现在已覆盖锦缎，内部构造尚未得见。左右壁最外侧的立柱尚残存有安装阑额和由额的长方形榫眼，说明正面原先应也有与后壁立柱位置对称、以阑额和由额连接的两根立柱〔图二十四〕。左右壁最外侧的立柱实为角柱，其上原先应有转角铺作，现左侧壁内尚可见到正心慢栱残迹。总体来讲，由这些残存的木构件我们大致可以推想无量寿佛殿的原始面貌应为一座典型的汉式大木构建筑，其地盘应为殿内无金柱，面阔三

间，进深三间，外绕十二根檐柱的布局。

从建筑整体平面布局上看，卓玛拉康三间殿堂连缀的长方形结构布局，的确是明初以来格鲁派都冈大殿形制的典型模式。然而，有所不同的是，三间殿堂作为一个整体外绕以转经廊道，这是15世纪以来格鲁派都冈大殿中已经弃置不用的形制[1]。转经廊道高度约6.38米，且转经廊地面较佛殿地面降低了约0.64米。同时在转经廊道内，笔者亦注意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即无量寿佛殿后墙以外的转经廊外侧墙体明显隆起，呈凹凸不平状，这与左边二殿后墙外转经廊墙体的光洁平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廊道东段宽度为1.6米，无量寿佛殿后墙外段宽度约1.63米，相较于左侧二殿墙外段略窄。两种墙体交界处的墙体内可见石质柱墩，其上仍存有立柱残段。此立柱位置恰好与无量寿佛殿内左侧檐柱大致处在一条直线上，而在转经廊东入口处亦有约略平行于无量寿佛殿门壁的石质柱墩，其上亦残存立柱〔图二十五〕。另外，无量寿佛殿后壁和右壁外的转经廊道上方约3.2米处

**〔图二十三〕无量寿佛殿遗存汉式大木构件**
1. 正壁柱上斗栱铺作、阑额　2. 左壁柱上斗栱铺作
魏文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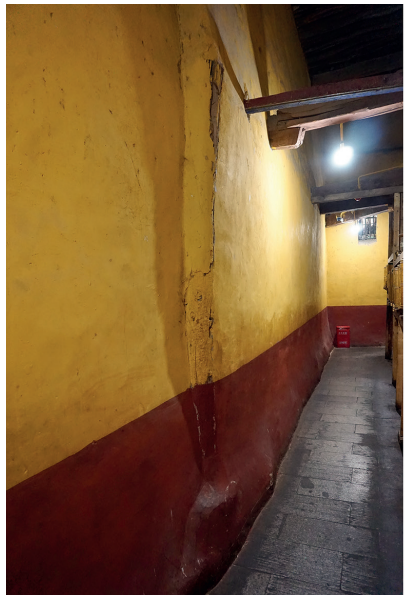


2

**〔图二十四〕无量寿佛殿左壁最外侧立柱上原安阑额的榫眼**
魏文摄



**〔图二十五〕无量寿佛殿转经廊早期建筑残迹**
1. 正壁墙外转经廊外侧凹凸隆起的墙体和残存柱墩和木柱
2. 东壁外转经廊道末端残存柱墩和木柱
魏文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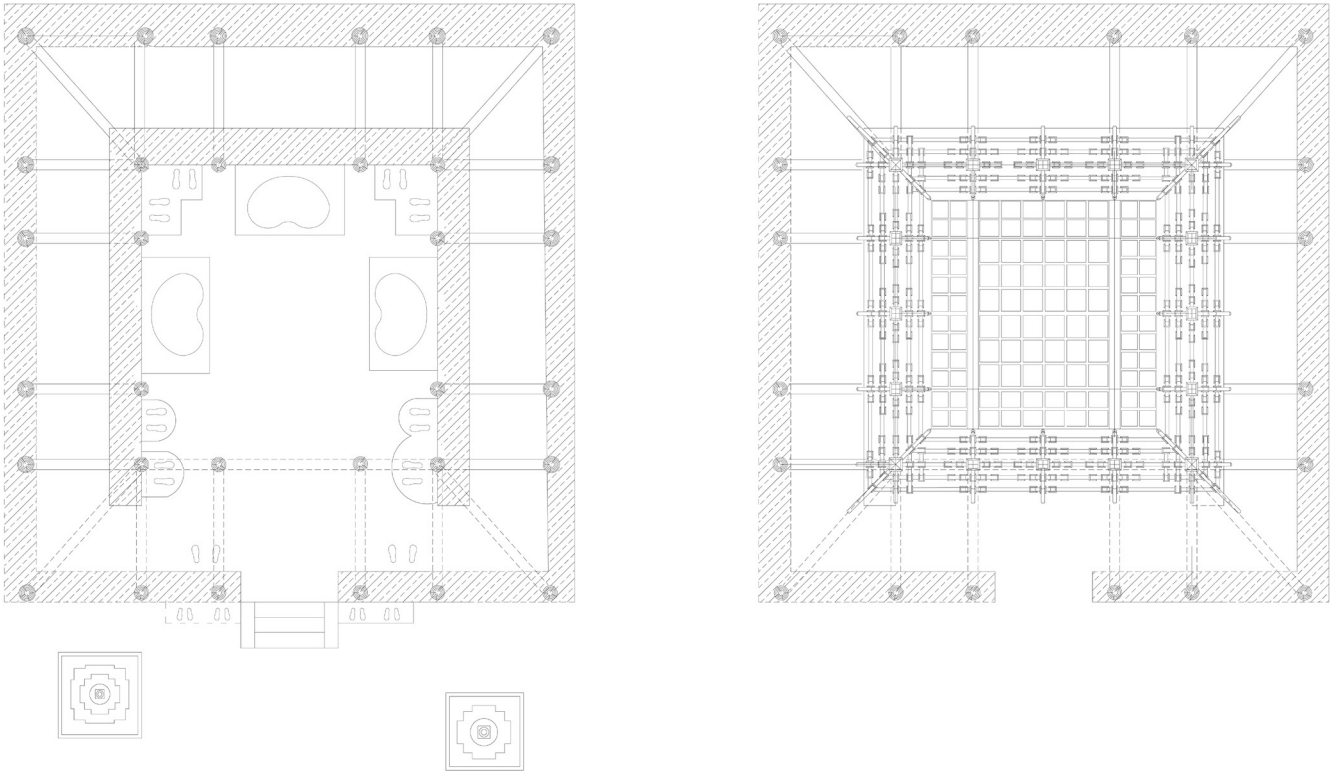
1



2

‹1› 此种都冈大殿典型者即如卓玛拉康之主寺热堆寺(Ra stod)措钦大殿。其平面测绘图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西藏古建筑测绘图集》第2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图二十六〕无量寿佛殿原状结构推想图
1. 地平面布局图　2. 天顶梁架、斗栱、平綦结构图
魏文制



1　　2

及与殿内檐柱对应的位置，均存有向外斜下约3°左右的方形乳栿，东北转角处还有斜置的角梁，它们都是一端插入无量寿佛殿墙内，且以榫卯形式插入檐柱中，另一端下垂搭在转经廊外墙内副阶檐柱上铺作的华栱或耍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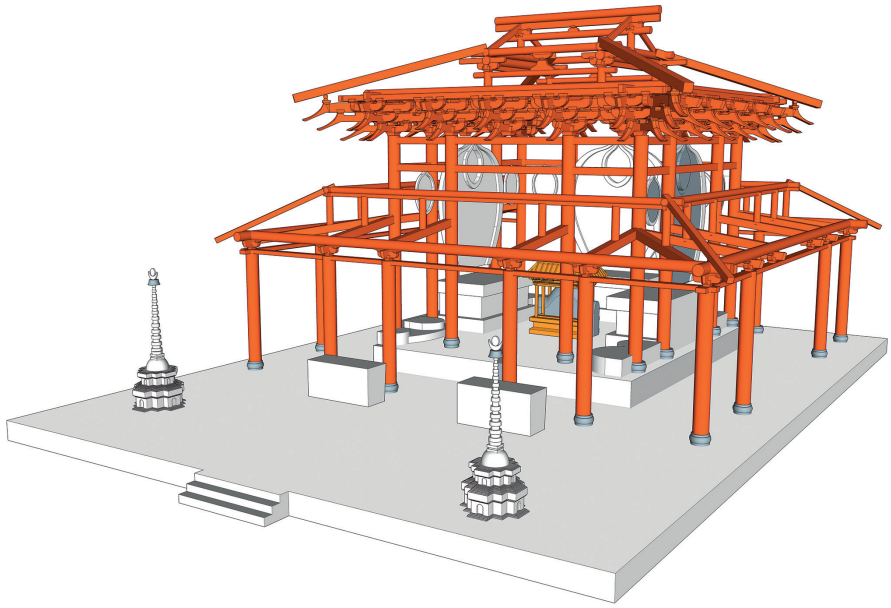
据上，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在清代改建之前卓玛拉康无量寿佛殿应是一栋独立的建筑，平面形制属于桑耶寺式佛堂，即中心佛堂外绕转经廊道的形式〔图二十六〕。建筑样式原本应是与夏鲁寺东无量宫大致相仿的汉藏结合式大木构佛堂，并在外观上呈现具有“副阶周匝”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1›〔图二十七〕。至于屋顶梁架结构被毁弃而改为藏式平顶的时间和原因，目前尚不得知，我们推测这一变化大致发生在清代中前期。在改造无量寿佛殿时，其左侧壁转经廊道被拆除后加建了左侧两间殿堂，并将后壁截断的转经廊道横向加长，包围左侧增加的两间殿堂，构成一条新的长方形转经廊道。四大天王塑像亦本应位于无量寿佛殿正门两侧，其中两尊仍在原处，而另两尊则因为殿堂改扩建而被挪移到了对称位置的尊胜塔殿门侧。

无量寿佛殿前左右分别布置有1.85米和1.70米见方的石围杆环绕、当中地表下凹的方池，池中各有

‹1›　有关这种汉藏结合类型的佛殿建筑，可参见笔者拙作《渐慕华风与形制重构：14世纪以来汉藏结合式佛堂建筑的文化图景》，《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

一座形制和尺度相近的白色佛塔〔图二十八〕。从外观上看，这两座佛塔显然经过后世的修补，尤其是较易受损的塔刹等部位，其建立年代显然已经无法从现存构件进行推论。然而从其造型来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高耸而粗细均匀的十三相轮和相对硕大的日月塔刹，占据了整个佛塔立面的主体，塔瓶则呈半球形，其造型不免令人联想到印度和西藏西部早期佛塔的样式，其下为双层的十字折角基座，正立面呈现层层叠涩的收分，上下层四向均有券顶开龛。从结构上看，还颇有早期西藏佛塔的垒石构成的台阶式的遗韵[1]。从形制上看，当归为象征释迦摩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吉祥多门塔(bkra shis sgo mang mchod rten)。其四隅结构因其叠涩收分较四向高三层，导致四隅折角立面高于四向立面，从而造成参差错落的视觉效果。从这样的造型以及双层基座上看，具有11世纪之前西北印度至西藏西部流行的早期佛塔的样貌，不少西藏西部古

〔图二十七〕无量寿佛殿原状大木构梁架复原图
魏文制



〔图二十八〕无量寿佛殿左右两处早期佛塔
魏文摄





‹1› 例如昂仁县嘎戈石刻的被断代为8—9世纪的早期佛塔，线描图可见索朗旺堆主编，李永宪、霍巍、尼玛编写《昂仁县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146页。

〔图二十九〕西藏西部早期吉祥多门塔遗存
1. 札达卡孜河谷早期的吉祥多门塔，11世纪
Tshe ring rGyal po und C. Papa-Kalantari；in co-operation with Christian Jahoda，*The Buddhist Monuments of Khartse Valley,Western Tibet*，Vienna，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AAS Working Paper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2009，Vol. 9，p.6，Fig.12.
2. 泥质佛塔，10–11世纪
［瑞士］艾米·海勒著，赵能、廖旸译《西藏佛教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56页，图2–1



1



2

格故城发现的佛塔图像擦擦和札达卡孜（rtsa mda' khwa rtse）河谷保存的实体建筑遗迹可以证明这一点‹1›。它们与当时已经在卫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东印度波罗王朝佛教艺术中的佛塔判然有别，而后者正是西藏后期佛塔造型之滥觞‹2›。此种类型的佛塔事实上是西北印度到西藏中西部地区后弘期初天降塔以外最为流行的一种塔式〔图二十九〕。

这两座形制几乎一致的佛塔其功能何在？笔者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两座佛塔作为早期遗存实际上与殿内的早期佛造像，确切地说是与殿内主尊很可能构成一个组合关系，而这正是林瑞宾（Rob Linrothe）所言之8世纪以来甚至晚至13世纪西北印度造像和绘画的传统做法之一‹3›。林瑞宾指出这种"一佛二塔"组合往往是以结转法轮印的释迦牟尼为主尊，二塔列于左右。但实际情况还可以见到很多情形，如以三世佛加二菩萨为主尊，右手触地印佛为主尊，甚至还有以金刚手菩萨为主尊的例子。总之，这是一个早期造像比较普遍的组合模式。就此我们推测此二塔和殿内三世佛、八菩萨可能就是这种早期组合模式的关系。

## 三　有关卓玛拉康创建和修缮的史料

这座汉式风格殿堂为何时何人所建是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通过梳理藏文文献，笔者在布顿大师的弟子译师绛曲孜莫（Byang chub rtse mo）所著《法王喇嘛丹巴索南坚赞传》（*Chos rje 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gyi rnam thar thog mtha' bar gsum du dge ba*）中找到了一个材料似乎可兹讨论。元代西藏萨

‹1›　夏格旺堆《西藏古代建筑佛塔历史沿革的初步研究》，西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63－264页。

‹2›　类似被断代在10－11世纪的西北印度和西藏西部的佛塔遗存还有不少，如艾米·海勒（Amy Heller）列举的一件泥制佛塔残件，认为其与托林寺周边的很多佛塔类似。

‹3›　这一传统做法罗伯·林瑞宾(Rob Linrothe)曾有所关注和论述，见Rob Linrothe, *Collecting Paradise: Buddhist Art of Kashmir and Its Legacies*,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15, pp.60-63.

迦政权行将覆灭时，萨迦派内部四大拉章斗争激烈，又与帕木竹巴万户经历了长期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形下，喇嘛丹巴索南坚赞被迫远走他乡，在位于今天拉萨西南的曲水县卓玛拉康西南四公里左右的确宗寺长期住锡，并经常在周边的聂塘、拉萨、温江朵、桑耶等地游方弘法。其后，喇嘛丹巴在阴木兔年(shing mo yos，1375)6月圆寂后，弟子们和卫藏僧俗领袖共同施资处理后事，其中一项就是在留下大师诸多足迹的地方建立内所依(nang rten)与外所依(phyi rten)，前者是在博东艾寺(Bo dong er)、确宗寺、桑耶寺等地塑造喇嘛丹巴上师身像，后者之一就是在聂塘(sNye thang)重修佛塔、佛殿，上述传记材料中记录了此事[1]：

> 在聂塘斡的古崩塘〔阿底峡（Atiśa）大师住锡、安葬之地——引者注〕，大菩提塔的金瓶、伞盖和法轮等用红铜制造并施以镀金，同时对其佛殿庭院等依次进行了非凡地设计建造，并在其上修建了g.yu thog等。

此处所说的“佛殿”应即今天的无量寿佛殿。藏文原文在这里使用的“g.yu thog”是一个西方所编著的藏文词典中不见收录，或理解为著名家族姓氏“宇妥”的词，然在《汉藏大辞典》里则指向非常明确，即指汉式建筑屋顶瓦作的构件“绿琉璃瓦”[2]。g.yu为汉语“玉”或“釉”的音译字，在藏文语境里主要指称“绿松石”，thog为藏文“屋顶”意，汉藏两种来源的字组合在一起，以绿松石的颜色来形容汉地绿色琉璃瓦的色泽实在是恰如其分。藏文里也使用汉文音译加意译的混合词g.yu rtsi(釉子)和g.yu chu(釉水)，来描述绿琉璃瓦表面具有光泽的玻璃质化合物。因此，我们结合上文所述可以推知，14世纪后期的这次修缮之后，无量寿佛殿整体上的样貌和后藏夏鲁寺东无量宫变得几乎如出一辙，即外观呈现为铺设绿琉璃瓦的重檐歇山顶式建筑〔图三十，图三十一〕。

此处使用绿色琉璃瓦覆顶的做法显然和喇嘛丹巴与夏鲁万户的家族渊源有关。喇嘛丹巴的母亲系夏鲁古相贡波贝(Zhwa lu sku zhang mgon po dpal)之女觉觉隆杰(Jo jo lung skyes)，出家后名玛吉薰努邦(Ma gcig gzhon nu 'bum)，喇嘛丹巴及同母兄、亦为萨迦座主的南喀雷必坚赞(Nam mkha' legs pa'i rgyal mtshan)都出生于萨迦的夏鲁康萨(Zhwa lu khang gsar)。喇嘛丹巴在二十五六岁时亦曾从学于布顿大师，与其关系密切[3]。有缘于此，喇嘛丹巴及其弟子有能力和资源调用那些掌握夏鲁寺汉式大木构营造法式、琉璃瓦烧造工艺等建筑技术的工匠群体，这些匠师要么可能直接参与过夏鲁寺的营建工程，要么就是这些匠师的亲传弟子。事实上，喇嘛丹巴及其弟子对琉璃瓦覆顶的汉式大木构做法不但知之甚详，而且相当偏好。在火阴猪年(me mo phag，1347)和火阳猴年(me pho sprel，1356)喇嘛丹巴两次主持修葺桑耶寺时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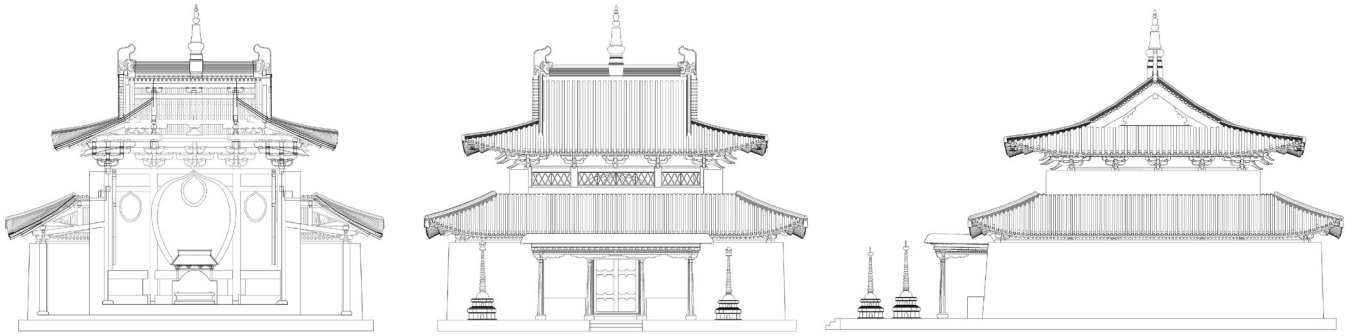
---

‹1› 原文作phyi rten la snye thang 'or gyi sku 'bum thang du/ byang chub chen po'i mchod rten gyi gser 'bum chen po gdugs chos 'khor rnams zangs las grub pa tsha gser can/ de'i lha khang khyams dang bcas pa la zhing bkod kyi rim khyad par can/steng la g.yu thog dang bcas pa bzhengs shing/,Byang chub rtse mo, *Chos rje 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 gyi rnam thar thog mtha' bar gsum du dge ba,*载*Sa skya pa dang sa skya pa ma yin pa'i bla ma kha shas kyi rnam thar,* [kathmandu]: sa skya rgyal yongs gsung rab slob gnyer khang, 2008, p.194.

‹2› 张怡荪主编《汉藏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624页。

‹3›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萨迦世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208、213页。藏文原文见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2—263、273页。

〔图三十〕无量寿佛殿1375年修缮后的三视推想图
魏文制



〔图三十一〕无量寿佛殿1375年修缮后的外观效果图
魏文制



为乌策大殿、萨迦班底达法座及其他附属殿宇的屋顶铺设了绿琉璃瓦‹1›。足见在他们的观念中，具有绿琉璃瓦屋顶的汉藏结合式建筑是佛教殿堂最为殊胜庄严的一种形式。

当然，琉璃瓦必然铺设于汉式坡面屋顶（rGya phibs）上，但架起屋顶的檐柱、槫栿、斗栱等大木构是否也是这次工程所营造则颇有疑问。从材分的角度看，夏鲁寺大木构与同时代元代内地官式建筑一致，用材仅为七等材，这比宋代同样等级的建筑要缩小许多‹2›。我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夏鲁寺斗拱铺作各构件十分纤细，与宋式建筑做法判然有别。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对无量寿佛殿大木构造行深入测绘，但是从其檐柱、斗栱外观上我们就能看出其材分显然比夏鲁寺大上许多，透露出元以前唐宋建筑的豪劲雄强之风。此外，泥塑造像的身光和头光都紧密贴合在墙壁和檐柱上，特别是左右壁最外侧菩萨，正好位于檐柱前方，所以其头光只能安装于柱上，现头光已失，可见为安装头光在柱面对应位置斫削出了平面。这种做法在三尊佛像身光接触檐柱之处亦依稀可见。这表明木构建筑极有可能与上述造像建立

‹1› *Sa skya pa dang sa skya pa ma yin pa'i bla ma kha shas kyi rnam thar,* [kathmandu]: sa skya rgyal yongs gsung rab slob gnyer khang, 2008, p.112, p.130.

‹2› 陈耀东《夏鲁寺——元官式建筑在西藏地区的珍遗》，《文物》1994年第5期，第9页。

于同一时期。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这座木构建筑几乎可以肯定为11世纪始建时期的原构。即便不是如此，我们亦无法完全排除元代后期藏地仍有掌握元以前汉地大木构工艺的传承匠师，但是考虑到此次修缮工程与夏鲁的密切联系，1375年的这次工程应该是屋面修缮而不是木构重建。那么卓玛拉康现存的大木构遗存到底始建于何时、又是谁来施造的呢？这还需要我们深入围绕其创建的相关藏文史料，尽量还原到历史原境中去加以忖度。

再回归到卓玛拉康本身建立的史料上来看它的建立缘起。揆诸藏文史料，我们可以找到多处阿底峡圆寂后在聂塘地方创建殿堂的记载，但是哪一处可以确定所指即是卓玛拉康仍旧不能遽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聂塘作为后弘期伊始上路弘法在卫藏的中心地区，其宗教地位迅速衰落，以致卓玛拉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几乎完全不见于史册。究其原因，大概是因阿底峡大师诸弟子间长期不合，且无法调和，导致法脉之正传在阿底峡圆寂后即转至热振寺和纳塘寺等地，而聂塘本地却法脉断绝。故此卓玛拉康的声名逐渐式微，而热振、纳塘等寺法脉赓续不绝，反而成为后世更为烜赫的佛教圣地。因此，卓玛拉康的早期历史仍然是一笔糊涂账，甚至连它到底为谁所建，现存建筑和塑像是否就是其始建之遗存都仍存在不小的疑问。现在我们就先梳理一下阿底峡大师圆寂时的藏文史料，来看一看当时都有哪些和卓玛拉康有关的人物及其营造活动。

历史上卓玛拉康所在地区常被称作聂塘斡[斡莫](sNye thang 'or['or mo])，故此寺亦被称作"斡之祖拉康"('Or gyi gtsug lag khang)，后来通称为卓玛拉康或是聂塘寺。这里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是阿底峡在卫藏地区偏爱的居所，他人生最后九年的大部分时光都住锡于此，并最终在木阳马年(1054)七十二岁时在此圆寂，荼毗后亦葬于此。卓玛拉康通常被认为是阿底峡大师的上首弟子仲敦巴嘉哇迥乃('Brom ston pa rGyal ba'i 'byung gnas)为了纪念阿地峡圆寂而在次年，即木羊年(shing lug，1055年)建立起来的一座小型佛殿，内供阿底峡大师本尊杰尊度母铜像，从建立之初就有卓玛拉康之名[1]。这段历史在《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有大致的记载[2]：

> 噶哇·释迦旺秋（sKa[Ka] ba Shākya dbang phyug）赶来了，他将尊者灵骨平均分给了库（Khu）、俄（rNgog）及其他诸人。尊者之佛像、经、塔及常修本尊佛像等给了仲敦巴；库师、峨师、噶格瓦（'Gar dge ba）诸师建造了一座灵骨银塔，把他们所得尊者之灵骨保存在里面。后来，他们把噶哇（sKa[Ka] ba）等诸人供养的物质搜集起来，在[木]羊年（1055）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祭奠法会。仲敦巴说"若有属于巴热（bha rag）者，应作我的助伴"，这么一说就在聂塘修建了一座祖拉康。

这段史料里提到仲敦巴在"聂塘修建了一座祖拉康(gtsug lag khang)"，可以大致推断所指即为卓玛拉康。然而，在历史文献中关于卓玛拉康的建立者还有其他的说法。如根据纳塘寺座主琛·虚空称

---

‹1› 西尼崔臣《拉萨市辖寺庙简志》(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7页。

‹2› 管·宣奴贝原著，王启龙、还克加译《青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44页。

（mChims Nam mkha' grags）所造《觉斡大宝圣者阿底峡大师共许广传》（*Jo bo rin po che rje dpal ldan a ti sha'i rnam thar rgyas pa yongs grags*，以下简称《广传》）的记载，阿底峡的几位近侍弟子之间关系不睦，经常互相诋毁攻讦，尤其是两位上首弟子仲敦和库敦之间多有嫌隙。故此在处理尊师的后事及其遗产的分配过程中众弟子多有分歧和矛盾，而阿底峡的其中一位弟子噶哇·释迦旺秋为阿底峡的三大弟子仲敦、库敦和俄敦三人公认的最为可靠和值得信任之人，故此大家委托他董理后事和析产。在阿底峡圆寂后的一年时间里，仲敦、瑜伽师赤乔（Khri mchog）等众弟子曾在此地分别讲说八千颂、入菩提行等教诫。当时拔部（rBa tsho）和热部（Rag tsho）为此做了很多供养。噶哇·释迦旺秋希望在阿底峡法座之地建造一座“小如斗室的佛殿”（lha khang bre tsam cig）安置这些供养。于是上述二部将其建造起来，并宣称这里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其他人做外供养即可[1]。这座佛殿是否就是卓玛拉康我们还无法确知，只能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上引《青史》所谓“若有属于巴热（bha rag）者，应作我的助伴”，显然其中的bha rag是拔、热二部（rba rag）之讹。

有意思的是，《广传》中也提到仲敦确实曾有在聂塘为安奉乃师灵骨建一斗室大小之佛殿的想法，但最终并未实现。当时的情况是此动议一出，其他弟子就向阿底峡的另一近侍弟子邦敦（Bang ston）询问在仲敦和其他上下所有瑜伽师当中谁可为之，邦敦却冷言：“仲敦巴其人不但无能，而且也阻碍了很多甚深佛法，其他上下所有瑜伽师只不过是一群马倌和烘麦。他（仲敦）想做什么就由他去吧，反正阿底峡如意宝已经圆寂了。”在这种情况下仲敦巴只能作罢，转念去那木的切玛沟（gnam gyi bye ma lung），也就是现今羊八井（Yang pa can）附近建立佛殿去了[2]。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卓玛拉康是由阿底峡的另一弟子邦敦·喜饶仁钦（Bang ston Shes rab rin chen）所建[3]。《广传》中记载，当时仲敦希望为阿底峡在热振（Rwa sgreng）建立灵骨堂，瑜伽师赤乔前往泥婆罗取来纯银以为营建灵骨堂之需。又延请印度神像塑匠行脚僧玛诺（A tsa ra ma no）在热振寺塑造灵骨堂中银质佛塔内曼荼罗佛会诸神，并建造了外在的佛塔。佛塔内装满了由纯银錾刻的陀罗尼呪字。仲敦此举在其他弟子看来，显然是一种确立自己上首弟子地位的方式。因此，其他弟子也不甘示弱，纷纷仿效仲敦的做法建立灵塔和佛殿，以供养阿底峡灵骨。如，俄敦建立了桑浦祖拉康（gSang phu'i gtsug lag khang），并模仿热振的样式建造了形制相同的银质灵骨堂，还派遣了一位戒律清净的比丘迎请了一瓷钵

---

‹1› 载仲敦巴等《噶当祖师问道语录》（*Jo bo rje lha gcig dpal ldan a ti sha'i rnam thar bla ma'i yon tan chos kyi 'byung gnas sogs bka' gdams rin po che'i glegs bam*），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12—213页。原文：bsnyen bkur gyi dus su ka ba shAkya dbang phyug gis gtam btang nas gzhan rnams ji ltar byed pa gyis/da rba rag gi bu tsho rnams kyi 'bul ba 'dir zhog jo bo gdan sar Lha khang bre tsam cig rtsig dgons byas pas kun gyis bzhag ste/rba rag rnams nged kyi gnas yin zer/gzhan rnams ni spyi mchod yin zer blags skad//。

‹2› gdung bzhugs pa'i lha khang bre tsam zhig snye thang nyid du bzhengs par dgongs la/gzhan dag gis bang ston la dge bshes ston pa dang rnal 'byor ba gong 'og kun la bshol thob byas pas/bang ston na re 'brom ston pas kyang go ma chod chos zab mo mang po'i yang gegs byas/rnal 'byor pa gong 'og 'di kun yang rta rdzi dang yos 'thag yin khong rang gang dga' bar thong /a ti sha yid bzhin gyi nor bu de ni 'das zer skad，载前揭仲敦巴等《噶当祖师问道语录》，第216页。

‹3› Matthew Akester, *Jamyang Khyentsé Wangpo's Guide to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Chicago, 2016, p.219.

的灵骨安奉其中。库敦亦建立了称作“甄之色东”('dren gyi se rdung)的祖拉康，他听说仲敦和俄敦分别建立了银质灵骨堂，于是修建了银质灵骨堂和一座未镀金的须弥山吉祥多门塔，它的左右据说各有一座金像和银像。邦敦亦建立了聂塘斡的祖拉康(sNye thang gyi gtsug lag khang)。由此在前藏阿底峡法座之地建立了四座祖拉康，其中邦敦所建者亦为上文提到的拔、热二族掌管。

另外，还有一说认为卓玛拉康是阿底峡的弟子香顿绛曲坚赞(Zhang ston Byang chub rgyal mtshan)在聂塘的斡地('or)建立的佛殿(gtsug lag khang)，所以又被称为“斡祖拉康”。沃地就是今天聂塘的斡玛村('or ma grong)[1]。阿底峡诸弟子中确有一位号Zhang ston者，不知是否即指此人。此说目前尚无相关文献佐证，聊备一说。

总而言之，我们还不能确定卓玛拉康的创建史对应上面的哪种历史叙述。然而，几种说法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寺庙是由拔、热二族建造并掌管的。拔、热二部与真、鲁梅二部在后弘初期佛教复兴运动中是活跃在拉萨一带最有权势的下路弘法卫藏十人之家族中的四大部族(Klu mes, rBa, Rag, 'Bring)，亦被合称为“四下律部”(sMad 'dul gyi sde bzhi)。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区域兴建了后弘期最早的一批寺院，并以此为根基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几大势力[2]。《青史》和《广传》虽然在倡建者上有所分歧，但在施造者和拥有者方面是一致的。事实上，后弘伊始，也就是11世纪初叶最早在卫藏创建的一批寺院大多都是在下路弘法上师之家族部落(tsho)的掌控下，与上述情形类似[3]。

## 四　余论

无量寿佛殿造像中，主尊无量寿佛和二胁侍菩萨具有较为纯然的藏式气息，继承了吐蕃晚期石刻造像和晚唐敦煌密教洞窟图像的特征，其余造像则表现出从盛唐到晚唐时期敦煌造像艺术的典型风貌，与源出于唐王朝核心地带的“长安样式”造像风貌一脉相承，这说明吐蕃时代以敦煌为中心的汉地造像工艺和审美意趣已深植于藏地人心，至后弘初期仍旧拥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些深受吐蕃以来东北方向河西走廊艺术影响的造像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直接源于中亚的艺术因素，东印度波罗艺术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即便有二者的影响也属间接来自于河西走廊的转化形式而非来自西藏西部[4]，这是卓玛拉康造像与深

---

‹1› 'or gtsug lha khang /……jo bo rje'i slob ma zhang ston byang chub rgyal mtshan gyis 'or gyi gtsug lag khang bzhengs par grags shing 'or ni da lta'i snye thang 'or ma grong du yod pa yin/_jo po rje ni rgya gar dang nye ba'i b+hanga ga la'i rgyal po'i bur 'khrungs shing / rta nas lo bcu gnyis tsam bod du bzhugs/_zhib phra bka' gdams chos 'byung nang gsal 'khod byung 'dug，琼觉(Blo bzang chos 'byor)《雪域名胜》(*Bod kyi dgon sde khag gcig gi ngo sprod mdor bsdus*, 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2› Per K. Sørensen and Guntram Hazo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sering Gyelpo, *Rulers on the Celestial Plain: Ecclesiastic and Secular Hegemony in Medieval Tibet, A Study of Tshal Gung-thang,*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7, pp.401-404.

‹3› Vitali, Roberto,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0, pp.37-39.

‹4› Yury Khokhlov, *Uncovering Amoghavajra's Legacy in the Hexi Corridor and Tibet*,《藏学学刊》(第21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受中亚影响的萨马达类型诸寺造像最显著的区别。同时，在11世纪东印度波罗王朝对西藏艺术产生越来越多浸润和塑造的背景下，卓玛拉康造像却看不出多少波罗艺术元素的踪影，这与11世纪后期的扎塘寺形成了显著对比。因此，卓玛拉康泥塑的创作年代放在11世纪中期，也就是历史文献谓其建寺之年代是比较合理的。它们是吐蕃时代在青藏高原东北方向汉藏之间佛教文化长期交流、融合下的历史产物。此外，考虑到造像和建筑之间的依存关系，造像的年代和风格样式对于我们判定佛堂建筑的建立年代也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标尺。

卓玛拉康早期建筑保存至今者唯有无量寿佛殿。此殿被包裹在后期建筑之中，原为纯汉式的大木构和坡面屋顶样式。中心佛堂为十二柱围合，上有典型汉式斗栱层的结构，外环以“副阶周匝”式转经廊道，故其外观为重檐歇山顶，这样的建筑做法与早期安多、河西地区常见的藏传佛教殿堂具有显著的继承关系。虽有文献记载1375年殿堂经历大修，殿顶铺设了绿琉璃瓦，然其斗栱层用材尺度显而易见地大于与之时代接近的夏鲁寺汉藏佛教建筑，体现出浓郁的唐宋之风。结合上述造像年代和风格因素，或可考虑其建筑年代可以上推至11世纪中期。然此说只能有待于揭开顶棚进行全面测绘后，综合建筑比例、材分、侧脚、营造尺甚至碳十四测年等方面信息才可判定。

而关于卓玛拉康的创建史，我们通过梳理藏文文献材料发现，11世纪中期阿底峡圆寂后在聂塘兴建佛殿的记述有多种说法，至于哪种说法可以确信为卓玛拉康创建之事，则仍旧莫衷一是。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卓玛拉康的创建和维持与当时活跃在前藏一带最有权势的四大部落（Klu mes, rBa, Rag, ’Bring）里的拔、热两族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卓玛拉康就是其部落私产，反而和西来的早期噶当僧众关系不大。这四大部落与后弘初期佛教复兴运动中从安多返藏的下路弘法僧众，即“卫藏十人”具有血统上的关系，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更确切地说，卓玛拉康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下路弘法部众主持营造的。浸润唐风的泥塑造像和纯然汉式做法的大木构殿堂在后弘期初期出现或许渊源于此。在后弘期发端的11世纪初，吐蕃虽已落幕长达两个世纪，但卓玛拉康浓郁的汉文化因素却反映出前藏地区与敦煌、河西走廊为中心的汉文化带仍旧处在同一历史语境和文化圈层之中。

附记：本文是中央民族大学与曲水县人民政府合作的“曲水历史文化工程”项目系列成果之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老师带领本院师生和本人一同对卓玛拉康进行了两次实地考察，期间组织同学进行了基础测绘，参与工作的有额震、马成芳、罗梓叶、边巴卓玛、李雨轩、李骁航、赵瑞、张京晶、黄丽钦、李羽谦、窦子萱等同学，在本文研究过程中，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夏格旺堆老师和清华大学李路珂老师亦不吝赐教，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何　芳）